

再次,虽然相关考古资料大量出土,并且就此研究的成果也不在少数,但总体来看,研究还多集中于就考古资料所进行的考古学专业研究,以及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研究上。对于考古成果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还很不够,还没有完全发挥出考古学对五燕史研究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文章难免挂一漏万,在引述学者观点时也可能有理解不到之处,敬请指正。

本文为西北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项目(自主创新类)

“五燕史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9Y2218)

“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9年8月21日至25日,“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召开。此次会议是我国参与并积极推进的多国申请“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讨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固原市人民政府、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除主办、承办方外,来自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多所高等院校、考古研究机构和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莅临大会,国外学者主要来自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和汉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诺丁汉大学等,有近100位代表参与了此次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苹芳研究员做了主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副所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专员杜晓帆博士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李堂堂副主席分别致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锦绣研究员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对“丝绸之路”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与会学者们都表示赞同。

此次讨论会,学者们围绕“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这两大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共有40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内容涵盖了有关“丝绸之路”历史和考古研究的许多方面,在地理范围上,贯穿了整个欧亚大陆和海上交通;在时间跨度上,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近代,可谓“纵横万里,上下千年”!

总的来说,大会的讨论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考古遗迹的介绍与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根据2006年参加的调查蒙古国突厥遗迹的活动经历,介绍了在蒙古国境内勘查过的10处突厥遗迹。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陈凌对突厥陵墓的制度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探究了突厥陵墓与唐代中原陵墓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山崖峭壁上,留下了许多古人开凿的佛教洞窟,这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张裕群根据麦积山东崖的坍塌情况,结合文献记载,指出麦积山佛窟是隋代初期开凿的。俄

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科瓦列夫考察了河西地区的芦苇墙和红柳墙,认为这是西夏国塞墙,不是汉长城遗迹,深化了对西夏国边地政策的认识。

此次大会令人惊喜的是,学者们对“丝绸之路”西段考古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全涛考察了北高加索地区的丝绸传播的路线,指出穿越高加索山的四座山口,并分析了在该地区发现的中国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参与了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布尔巴仁遗址的挖掘工作,认为布尔巴仁遗址在8—9世纪时是回鹘汗国强盛时期供可汗避暑休憩的夏宫,并对其仿唐朝的建筑风格作了说明。

第二个方面是丝绸之路上考古器物的研究。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贸易的通道,也是技术传播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实总结了十六国时期吐鲁番地区的丝绸生产问题,丝织户的出现表明该地区丝绸业发展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文物出版社葛承雍研究了唐代的狩猎俑,结合文献资料,对唐代的狩猎风俗和蕃人地位作了细致的分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郭物研究了欧亚草原地区发现的铜鍮,具体分为三个类型,对其与中原铜器的关系也作了必要的说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姜波根据在中国发现的56枚拜占庭金币,结合汉代文献,考证了中国和拜占庭之间的交通路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马文宽专门探讨了带有角形回纹的器物,这是他多年不断收集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关注的考古发现并不局限在中国境内,对国境之外地区也有所涉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张良仁介绍了在阿富汗地区发现的中国器物,包括铜镜、丝织物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白云翔则对中亚地区出土的种类奇多的汉式镜和仿汉镜做了甄别,并分析其各自特点,指出花纹样式的不同是主要区别标准之一。

在丝绸之路上,器物和技术的传播不是单向的,输入中国的技术和器物也十分丰富。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院宋馨对汉唐时期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吸收西方技术的情况作了说明,指出应加强对西方传入技术的研究。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Lukas Nickel考察了秦始皇陵墓里的兵马俑形象和石窟造像在雕刻技术中存在的区别,提醒我们注意丝绸之路上中外技术和思想的互动关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仁湘考察了西亚小麦在古代的传播路线,并分析了汉代形成的饼食传统。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汤惠生通过新石器时代彩陶和汉代画像砖的中西比较,强调了西方技术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黄珊对元代青花瓷的传播路线进行了研究,重点放在海上传播线路上,并对西亚、北非等地发现的青花瓷进行了研究。

元代,出现了一位沟通中西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关于他是否到过中国,学术界至今还存在争论。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考察了他在威尼斯看到的唯一一件由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去的陶罐,被称为“马可波罗罐”,他还介绍了旅行中的发现。法国高等实践学院的刘清华介绍了保存在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图书馆的马可波罗遗嘱,在遗嘱中马可波罗提到了一位“鞑靼”仆人,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可波罗来过中国。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乌云高娃则补充了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她介绍说,松田孝一认为《马可波罗游记》讲述中国所使用的词汇都是波斯文的,因此他对中国的认识只是道听途说而已。科瓦列夫介绍了俄罗斯人对该问题的研究,也支持马可波罗未到达中国的观点。总之,这是一个聚讼较多的问题,需要不断地研究下去。

第三个方面是丝绸之路上的宗教研究。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芮传明翻译了摩尼教帕提亚组诗《安嘎德罗希南》,对加深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研究有积极意义。中山大学历史系王

媛媛以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残片Ⅲ7283文书,分析了高昌摩尼教艺术中的女神形象特征,并同佛教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研究。暨南大学历史系张小贵探讨了祆教神祇密特拉的渊源及其形象问题,结合中国的考古发现,梳理出祆教神的演变过程。研究壁画,前期的工作之一就是拍摄影像。英国诺丁汉川特大学科技学院梁海达和张群喜介绍的PRISMS成像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拍摄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对于保护壁画也有益处。

最后一个方面是历史专题和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李锦绣对固原出土的粟特人史诃耽墓志进行了细致考证,结合史籍文献,探讨了史诃耽的生平事迹、在唐初政治中的作用,并分析了墓志反映的唐初监牧制度和译语制度等。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张铁山介绍了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书的情况,并论述了其学术价值。北京大学考古文博系沈睿文研究了安禄山服散的问题,提醒考古发掘中应重视文物的排列情况。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李花子探讨了大韩帝国(1897—1910)时期的疆域观念及其间岛政策的实施,指出近代之前并没有形成积极扩张的对外主张,相反,近代日本对间岛政策的吸收,导致了对外的侵略扩张策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孟彦弘研讨了发生在今宁夏地区的唐代肃宗即位事件,分析了这一事件对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积极意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李艳玲论述了两汉时期塔里木盆地绿洲农业采取的“寄谷”与“仰田”两种形式,结合国内外研究,加深了对塔里木盆地农业发展状况的认识。台湾朝阳科技大学耿慧玲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丝绸之路和当代石油贸易的相似性,对于从宏观角度认识丝绸贸易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有积极意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聂静洁考证了唐中期悟空法师的生平事迹,对他入竺求法和归国路线也分别作了考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张卫光研究了突厥之前内陆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战争战术问题,主要就骑兵的战术作了分析,认为游牧战争对自身、绿洲国家和定居文明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北京大学历史系胡鸿通过以“江”称谓河流名在东北地区的使用,作为一个事例论证了古代文化交流的连续性。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杨蕤对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作了述评,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乌云高娃通过对围绕忽必烈与高丽太子僖的会见及高丽迁出江华岛到旧都开城等一系列事件的考察,探讨了十三世纪后半期的蒙古和高丽的关系。武汉大学经管学院也小红研究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至元代几件契约文书,这是从俄藏黑水城文书中发现的,运用该文书研究问题,可见其珍贵。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贸易交通之路,也是文化交流、技术传播的通道,在人类交往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它的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大问题。此次会议的召开,学者们互相交流研究成果,为今后继续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丝绸之路将承担连结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再次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张卫光)

欢 迎 投 稿